

战争加害引发的心理创伤以及其世代间连锁关系及和解修复的尝试

—使用“HWH: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(抚慰历史的伤痕)”的方法

村本邦子(立命馆大学)

1. 开始

二十多年来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士，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虐待、性暴力、家庭暴力等以女性和孩子为对象的暴力问题。我渐渐明白了，如何理解并面对过去的战争加害所引发的心理障碍，才是无法逃避的问题根源所在。在个案的咨询治疗中，如果顺着孩子的问题往前追溯，就会发现父母那一代的暴力行为，而如果再接着追溯前一代，就会追溯到战争这样的集体性暴力。战败后，从战场归来的青年人为了不让自己想起过去而匆忙结婚，于是出现了生育高峰，有很多孩子降生。为了重建只剩下断垣残壁的日本，可以想象当时的日本人是多么努力拼搏。然而那些拥有超出想象的非人经历的男人又能组建怎样的家庭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养鱼了下一代，之后又有了再下一代。

心理创伤如果被过度压抑，就会引发再次体验、麻痹或逃避、敏感等症状。再次体验的案例非常多。我有很多次听到女儿们的证言：“父亲从战场归来后，几乎每晚都被梦魇折磨”。甚至有上一代妇女在我耳边偷偷告诉我：“从战场回来的兵，有哪个不在家里使用暴力啊”。成为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的名称确立契机的越战士兵的问题，不正是酒精依赖症和家庭暴力吗？我还找到了这样的例子。战争刚结束不久就被判死刑的连续强奸杀人犯，在供认书中写下了令人发指的强奸犯的话：“上海事变的时候，我干了强奸这件了不起的事情。”（本多，1997年）。这就是再次呈现的例子。做任何事情都不带自己的感情，无法和家人培养亲密的关系，这类男性的麻痹和回避，不正是日本男性的典型问题吗？仿佛为了弥补这个问题，他们拼了命工作，使日本经济奇迹般得到复苏，其实正是过度兴奋引起的反应。

2. “加害心理创伤”与心理创伤的连锁

一次暴力的破坏力超乎想象。换言之，暴力发生的瞬间，就已改变过去和未来。如果暴力反复发生，像根根丝线能织成布匹一样，暴力最终会构成人生。在社区中也是一样。大众范围的暴力会破坏社会共同体，给社会共同体本来的正确

方向带来不良影响。如果不加以干涉，暴力的影响力会超越世代被传承下去，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畸形。

在此，把暴力被害引起的影响称为“心理创伤”已无任何异议。但是，将暴力加害导致的影响称为“心理创伤”尚存在问题。因为这种叫法会给人将被害者和加害者同等看待的感觉。在这我要澄清一点，在特定的暴力事件中，加害者是负有绝对责任的。加害者在其它关系中有可能是受害者，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将加害的责任一笔勾销。

本来心理创伤 (trauma) 这个词原意是指身体的创伤。“所受打击的残片仍会在潜意识里留下阴影。而且，这一点只有在‘催眠’状态下才能被确认。如果一直停滞于此，就会给心灵扎上一根“心理创伤”之刺。”自 1894 年威廉杰姆斯 (William James) 这样记述以来，这个概念渐渐地开始被赋予精神层面的意思 (牛津英语辞典)。据利夫顿 (译者按：Robert Jay Lifton) (1993 年) 对纳粹加害者的研究，加害时会出现“双重化现象” (doubling)，即内部解离状态。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“部分自我”，这个“部分自我”会迅速扩大，占据自我的大半部分，然后以自律自我开始行为活动。如果出现了这“第二个自我”，所谓的“普通人”也会做出十恶不赦的事。之后，“被双重化”的自我如果一直都无法完成重新统合自我的心理过程的话，这名加害人就会一直带着被解离的畸形自我生活下去。

正如杰姆斯指出，如果一直存在于未能统合的潜意识、如刺一般一直给人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，它就被定义为“心理创伤”，加害者的问题也应当被称为“心理创伤”。

为避免以上的误解，在此我会用“加害心理创伤”这个词，以此和受害者的心理创伤区别开来。但我完全没有意图通过使用“心理创伤”这个词汇来暗示加害者也被伤害过、也是受害人。

“加害心理创伤”同样会传给下一代。我举一个关于剧团 IMAGINE21 的负责人、渡边义治的例子 (村本，2008 年)。他曾是被害儿童，同时又是家庭暴力事件 (原) 加害者。他父亲是旧满洲国的军队将校，战后被判为 C 级战犯。渡边出身于 1947 年，在父亲的拳脚相加和颓废不堪的家庭气氛中长大。他的父亲就如上文提到的那样，经历过以恶梦和暴力的形式的再体验、在再演“加害心理创伤”的同时，养育了下一代。渡边高中毕业就离家出走，一头扎进了戏剧里，并和之后认识的横井量子结了婚。因母亲的事情为导火索，他开始向妻子施暴。

母亲不久便自杀。渡边曾这样说：“我不记得为什么自己如何停止暴力行为的。或许是因为我慢慢地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了，也渐渐可以理解妻子说话的意思，以及被殴打的人的心情。”

渡边“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”的契机，是他在1989年观看了以被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为主题的纪录片，由此深切感受到父辈的罪行。于是他写下了“再会”二字，和妻子横井一起在13年中奔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。2006年开始，为了演出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《地狱12月～哀恸的南京》，他们在日本各地奔走。他说：“基本上，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会在一瞬间土崩瓦解。追求及时享乐，遗忘过去。战后出生的人们也毫无意识地继承了这样的文化。看最近杀人事件的报道时，我突然想，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地沦为杀人犯其实是想逃避现实。我们本身的存在，到底是由什么样的精神结构构成的？我们只有在正视它的时候，才可能找到解答。”

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渡边的痛苦正是家庭暴力中长大的孩子的症状。对于渡边的焦虑症状和自残行为，可能精神科医生给他用了药，而心理治疗家则用自然疗法为他做了治疗。如果是以前的时代，他的妻子大概会被送到避难所，而丈夫则要接受加害者心理治疗。但这样问题就能解决吗？基辅洛夫斯基（译者按：Sichrovsky）（1987年）提到，以纳粹加害者的孩子的心理后遗症为对象的研究几乎为零。他提出了以下的疑问。1960～70年代的心理学术热潮使西德诞生了几百万名的专家，他们确为使国民的幸福和满足感付出了努力，但那只不过是从小集体野蛮行为转变为罪恶感的集体压抑而已。不少患者的心理障碍明明是出自成长于纳粹加害者家庭这个事实，而专家又是用什么方法治疗他们的呢？

心理学热潮在日本出现比较晚，但这个现象也正表明了日本的问题所在。让人感到讽刺的是，“加害心理创伤”靠心理学热潮而得以隐蔽起来，并随着世代繁衍继承了下去。之后怎样了呢？同样被渡边提到的杀人事件、割脉和流行大量服食药物等现代日趋表面化的年轻人的问题，都与“加害心理创伤”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3. 正视过去～认识 HWH

那么有什么方法能使自己正视这个问题呢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2007年3月，我参加了在立命馆大学举行的，由阿芒德·沃卡思主持的场景再现剧《战后一代

继承到的亚洲战争》。在那里我得以认识了 HWH（译者按：Volkas, 2009）。关于 HWH，稍后会有详细介绍，所以在这里我先省略地说明一下。当时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。所谓场景再现剧，是由一位观众讲述自己的经历，演员们将他 / 她的经历以即兴剧的形式再现出来，所有参加者一起共同拥有他 / 她的这些经历。

当即兴剧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，在座中立刻有人指出主持人沃卡思本人就来自丢下原子弹的美国，并感情激烈地高喊：“事实上日本才是受害国！”场下当时一瞬间气氛僵硬，但沃卡思，他镇定并真挚地接受了这些，并且这个人的想法由其他演员表演了出来。如果是平时的话我可能早已怒火满腔，但当时我看着舞台，这句话中深藏着的巨大哀伤和伤痕沉重地出现在我的心里，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。没有出现情绪化的纠纷，没有一个人辩解，也没有人离开场地，再现剧在安静中进入下一幕。

在剧场中，演员们从提供的片断中集中精神倾听这个人心里的各种声音，然后把它们分别表演出来。我一直说，无论什么样的声音都不能被无视，都有被倾听的权利。但我也开始思考，莫非杀戮就是从心中某一个声音开始的。而别人为了拯救所有的声音，全身心投入倾听他，并努力想和他 / 她共同感受。在旁边那么多见证人的守护下，我相信无论怎样的声音都一定会被改变。

由本次活动的策划人、村川治彦主持的“用心灵和身体理解历史研究会”认为，至今日本很多历史教育和和平教育都过于将重点放在客观事实上，因此使历史带上各种人为的感情。导致有关战争的记忆以带有某些具体意义的形式被传承下来，而很难与自己的生存方式关联起来去理解历史。南非的“真实与和解委员会”（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）提出了“4个真实”的观点。即，①事实本身的真实，或者法庭的真实；②个人的真实，或者叙事的真实；③社会或者交流的真实；④治疗、恢复的真实。特别是②“个人的真实，或者叙事的真实”和③“社会或者交流的真实”，希望从这两点出发，日本青年和其他国家的青年能够以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基础进行交流，以④“治疗、恢复的真实”为共同目标，为新关系的展开开拓道路（村川，2009年）。

2007年11月恰逢南京大屠杀70周年，我和“用心灵和身体理解历史研究会”的成员一起参加了于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“回忆南京”国际会议。这次会议基于以上的观点，鼓励与会者陈述各自的见解，表达出各自的感情。会议目的在于，

关于中日战争和发生在南京的悲剧，大家能打开心灵，倾听对方声音。来自日本、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参加者一起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言，访问屠杀的发生地，举行慰灵仪式。全体人员又分小组，安排了充分的时间分享各自的感受。中间还穿插了轻松的运动和音乐环节。

不知何时开始我的内心一直有声音在说，要去南京看看。仿佛是被不可思议的力量带领着，我决意把我的一切交托给它。我最大的目的是想让理智无法接受的东西能在心里确定下来，换言之，我希望能多少减轻一点自己的感觉麻痹，如果能得到缓解，就可以观察接下去我会有怎样的变化。我母亲是东京大空袭的幸存者，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听着那些辛酸的往事长大。回头想想，当时还是孩子的我，被那些超出我理解能力的恐怖而悲伤的叙述吓坏了。为了不至于自己陷入崩溃，我用“战争已是遥远的过去，和我无关”的借口把自己保护了起来。我很难有战争曾经“完整存在”的感觉。这次我感到时机已经成熟，我才能彻底卸下自我防备，打开心怀，来到了这里。我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次活动给我带来的影响，但我非常确定，它给我带来的是非常好的东西。

听取幸存者的证言、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的第一个晚上，我出现了剧烈的头痛和呕吐。第二天早上我已经恢复正常，而日方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痛、发热、呕吐、疼痛等身体上的症状。很明显，大家的身体都出现了反应。与此同时当我在纪念馆看到日军士兵照片的时候，无疑自己就是加害国的一分子，这个感受在我的心里得到了确认。在屠杀纪念地我和同行的日本人一起流泪，能够向中国人民谢罪，我感觉自己心中的冰块终于得以融化。我感觉自己为“完整存在”踏出了一小步。

我还受到了中国年轻人友好热情的接待，他们也向我表达了“想和日本的年轻人交流”的强烈愿望。我们决定，下一次，我们会带着日本年轻人重访这片土地！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在定期举行小型学习会的基础上，2008年7月，我们总结了至今做过的尝试，在京都实施了为期四天的和平教育活动。其中包括由上面介绍的IMAGINE21演出的史实改编舞台剧《地狱十二月～哀恸的南京》、题为《用身心理解由历史而来的心理创伤～亚洲战后世代继承的战争体验、迎接阿芒德·沃卡思》的再演小剧场，还有两天的工作坊。另外2009年3月，洛杉矶举行以《修复断桥～正视第二次世界大战遗产的中日文化》为主题的HWH工作坊。通过HWH，我和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交流的同时，一边自己拥

有的来自历史的心理创伤也得到了治疗。我开始体会到 HWH 的目标，还有它六个步骤的意义。于是，2009 年 10 月，日本的年轻人们和 HWH 重访南京终于得以实现。

4. 最后

在心理学上，由暴力引起的心理创伤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使人孤立起来。我们要克服这一点就必须恢复这些联系。把过去、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，和他人联系起来，向世界打开心扉。而把个人史和历史联系起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换言之，把个人的暴力性和历史的暴力性联系起来一起探讨。在大背景里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关系的两个事物，一定要把它们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。这也是在跨学科和国际性的联系中，亟需继续探讨的课题。

参考资料

本田勝一 (1997)『南京大虐殺』朝日新聞社

Lifton, R. J. (1993). From Hiroshima to the Nazi doctors: The Evolution of psycho formativ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traumatic stress syndoromes. In J. P. Wilson & B. Raphael (Eds.),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s. New York / London: Plenum Press.

村本邦子 (2008 年)《从家人继承到的遗产—战争及心理创伤》,《女性生活史研究》第 18 号, 村本邦子

村川治彦 (2008 年)《用演剧疗法通过体验式过程进行和平教育的尝试》,日本心理临床学会《心理临床广场》1 卷 1 号

Sichrovsky, P. (1987) Schuldung Geboren. Verlag Kiepenheuer & Witsch Koln. (日语译著: 彼得·吉夫洛夫斯基著, 玛萨科·谢恩各译,《纳粹的孩子们~爸爸, 战争中你们做了什么?》第二版, 1988 年)

Volkas, A. (2009).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: Drama Therapy in Collective Trauma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 Resolution. In R. Emunah & D. R. Johnson (Eds.). Current Approaches in Drama Therapy. Springfield, Illinois, Charles C. Thomas.